

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研究^{*}

闫超, 金晓彤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 GDP 的同比增长率数据, 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运用冲击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具体考察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问题, 结论表明: 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 GDP 增长率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不尽相同。GDP 增长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较大, 而财政政策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财政收入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大于财政支出增长率对 GDP 的影响程度。财政政策对 GDP 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弱,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强。与财政支出增长率相比较, 财政收入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冲击响应更为明显, 而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更大。财政收入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影响的贡献程度不断增加, 财政支出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影响的贡献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财政收入增长率比财政支出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度更大。

关键词: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GDP

一、引言

自从凯恩斯提出“宏观需求管理”的思想开始, 财政政策究竟能否视为稳定一国宏观经济的可靠工具, 始终是宏观经济学研究范畴中的重点和焦点问题, 而各国学者们最终所获得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在理论研究方面, Hansen (1941) 以及 Woodford (1995) 指出财政政策的相机变化能够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Friedman (1953) 认为从决策者计划实施财政政策开始到该政策真正付诸于实施, 需要历经一定的时间, 换句话说, 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特征, 这将会使得最初用于稳定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 引发宏观经济更为剧烈波动态势的出现。Barro (1990)、Barro (1993) 以及 Kormendi 等 (1985) 强调采取不同融资方式的财政支出无法使得社会总需求产生实质性的改变。然而, Taylor (2000) 却认为财政政策的调整不仅无法实现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而且还存在致使宏观经济产生剧烈波动的风险。

在实证研究方面, Karras 和 Song (1996) 以及 Christiano 和 Harrison (1999) 通过研究认为, 政府的规模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 然而尽管如此, 仍然不能通过扩大政府规模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健增长, 因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还会伴随着更多税收负担的出现。Blanchard (2000) 强调, 政府规模加大的国家, 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相对较弱, 同时, 当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时, 该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也随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Paul 和 Noord (2000) 的研究指出, 财政政策在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时, 不仅能够改善经济绩效, 而且还能够弱化财政支出和税率的频繁变动。Cohen 和 Follette (2000) 指出, 财政政策所具有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冲击, 然而对社会总供给的冲击没有实质性

作者简介: 闫超 (1985 -), 女, 吉林省吉林市人, 吉林大学商学院讲师, 管理学博士, 经济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与计量; 金晓彤 (1964 -), 女, 吉林省长春市人, 回族, 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教授, 经济学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学。

^{*}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编号: 12JZD0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消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2AZD0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评价中的应用”(批准号: 7120307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调控模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批准号: 11YJC79015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批准号: 2013M53096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经济转轨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调控模式研究”(批准号: 2014T70272);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批准号 2012BS051) 资助

的作用。而 Fatas (2001) 甚至较为极端的指出, 财政政策存在取代货币政策成为调控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手段。Daniel (2002) 以及 Alan (2002) 的研究都认为, 在美国虽然税收体系可能会不断变化, 但是税收政策所发挥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不会改变, 并进一步减缓了美国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

在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 郭庆旺等 (2003) 基于自回归动态模型, 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贾康 (2004) 探讨了我国财政政策在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靳春平 (2007) 不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的空间差异性特征, 而且还从实证角度进一步印证了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当中的确在空间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性特征。闫坤和张鹏 (2009) 基于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分析, 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白彦和吴言林 (2009) 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研究发现, 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结构突变特征, 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罗来军等 (2009)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检验了我国中、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王文甫和王雷 (2012) 发现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而洪涛 (2012) 认为我国财政政策的效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季节性的影响。

考虑到深入分析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关系问题极为重要, 在本文中我们利用经典的计量经济模型, 全面透析和测度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潜在关系, 以期在洞悉我国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 为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测度

我们首先将构建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继而通过运用冲击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具体考察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问题。在此, 为了提出季节趋势, 我们选择 1993 年第 1 季度至 2014 年第 1 季度期间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以及财政支出同比增长率季度数据度量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 同时选择 1993 年第 1 季度至 2014 年第 1 季度期间的 GDP 同比增长率数据度量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数据均源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 1 首先给出了我国 GDP 增长率 (GDP) 及其波动成分 (CYCGDP) 和趋势成分 (HPGDP) 的时间轨迹。如图 1 所示, 自 1996 年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经济增长都呈现出了持续稳健的增长态势, 但是自 2007 年下半

年起,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率表现出陡然下降的态势, 此情况持续了长达 2 年之久, 自 2009 年下半年起, 我国经济增长率又呈现出攀升的迹象, 并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然而, 从最近 4 年经济增长率的总体发展态势来看, 仍然呈现出大致缓慢下降的趋势。我们从 GDP 增长率趋势成分 (HPGDP) 的时间轨迹可以更为清晰地发现上述规律。具体而言, 在 1996 年前后, GDP 增长率趋势成分呈现下滑的迹象, 随后, 在 2007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 GDP 增长率趋势成分始终呈现出稳健攀升的迹象, 而自金融危机出现至今, GDP 增长率趋势成分呈现出缓慢下移的趋势。此外, 我们从 GDP 增长率波动成分 (CYCGDP) 的时间轨迹可以直观地发现, 在 1996 年我国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前的时间范围内, 以及在 2007 年至 2011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范围内, 我国 GDP 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剧烈波动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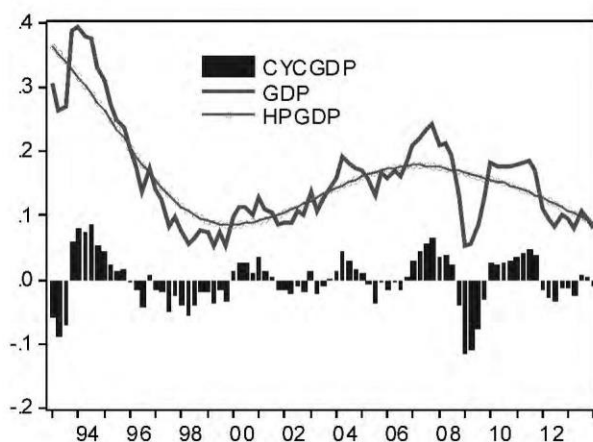


图 1 GDP 同比增长率时间动态轨迹

图 2 描绘出了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 (SR) 及其波动成分 (CYCSR) 和趋势成分 (HPSR) 的时间轨迹, 我们能够直观地发现, 在 1996 年以前,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呈现较为快速的增长, 而自 1996 年开始直至 2007 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范围内,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始终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小幅上下徘徊和游走, 而自金融危机爆发开始至今的时间范围内, 我国财政收入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迹象。财政收入增长率趋势成分 (HPSR) 的时间轨迹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此外, 我们从财政收入增长率波动成分 (CYCSR) 的时间轨迹可以发现, 在 1996 年我国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前的时间范围内, 以及在 2007 年至 2011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范围内,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呈现出十分剧烈的波动迹象, 而在其他时间范围内, 财政收入增长率所具有的波动特征较为稳定也较为微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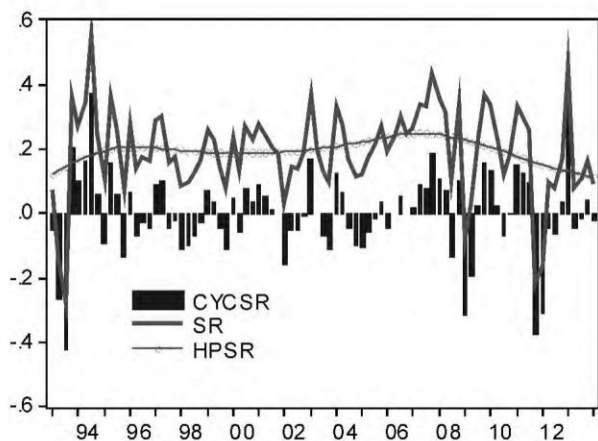


图2 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时间动态轨迹

图3 刻画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 (ZC) 及其波动成分 (CYCZC) 和趋势成分 (HPZC) 的时间动态轨迹, 我们能够直观地发现, 与 GDP 增长率以及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不同, 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在 2008 年之前的时间范围内, 表现出较为平稳的变化态势, 而在 2008 年, 即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时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时期, 呈现出陡然增长的突出表现, 继而又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即在 2011 年至今的时间范围内, 呈现出短暂而剧烈的陡升骤降的波动态势, 就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趋势成分 (HPZC) 的时间动态轨迹而言, 总体上较为平稳, 仅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呈现出微弱的波峰迹象, 随后不断下滑。而从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成分 (CYCZC) 的时间轨迹可以发现, 在 1996 年我国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前的时间范围内, 以及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至今的时间范围内, 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呈现出较为剧烈的波动迹象, 尤其是在近些年的时间内, 此波动迹象更为突出和明显, 而在其他时间范围内, 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始终呈现出微弱的小幅波动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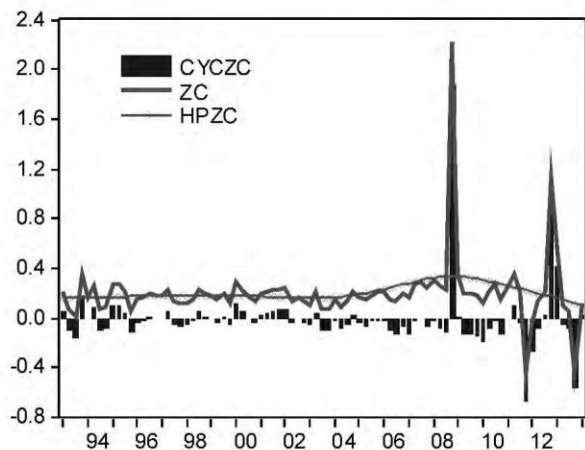


图3 财政支出同比增长率时间动态轨迹

鉴于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不仅可以分析不同

时间序列之间所存在的影响机制问题, 而且能够探究随机扰动项, 即外部冲击对所构建的整个模型系统的影响情况, 因此, VAR 模型不仅愈加受到重视, 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的冲击影响。

标准的 VAR (p) 模型可以具体表示为如下形式:

$$y_t = A_1 y_{t-1} + \dots + A_p y_{t-p} + B X_t + u_t \quad (1)$$

其中, y_t 代表 n 个维度的内生变量, X_t 则代表 d 个维度的外生变量。而 $A_1, \dots, A_p$ 以及 B 都代表系数矩阵。此外, 式中的 u_t 代表随机发生的扰动项。我们还可以将方程 (1) 进一步表示为如下形式:

$$\tilde{y}_t = A_1 \tilde{y}_{t-1} + \dots + A_p \tilde{y}_{t-p} + u_t \quad (2)$$

其中, $\tilde{y}$ 代表个维度的内生变量 y_t 对 d 个维度的外生变量 X_t 的回归残差值。我们可以将其具体表示为:

$$A(L) \tilde{y}_t = u_t \quad (3)$$

在此, L 代表滞后算子, 而滞后算子 L 的参数矩阵具体形式为: $A(L) = A_0 - A_1 L - A_2 L^2 - \dots - A_p L^p$, $A_0 = I$ 。

参考上述标准的 VAR 模型, 在本文中, 我们将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 (SR) 视为 X_1 序列, 将我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率 (ZC) 视为 X_2 序列, 将我国 GDP 同比增长率 (GDP) 视为 y 序列, 从而获得如表 1 所示的 VAR 模型各个系数的具体估计结果, 在此, 我们根据 AIC 和 SBC 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p=2$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滞后一阶的 GDP 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 1.1493, 滞后两阶的 GDP 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 -0.1994,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 GDP 增长率对其自身影响的方向和大小都截然不同。滞后一阶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235, 滞后两阶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318,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均呈现微弱的负向影响。滞后一阶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179, 滞后两阶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093,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也存在较大差异。滞后一阶的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1.2699, 滞后两阶的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1.0059,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方向和大小都存在差别。滞后一阶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 0.2389, 滞后两阶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 -0.0498,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都不同。滞后一阶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114, 滞后两阶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0248,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都呈现负向影响。滞后一阶的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579, 滞后两阶的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1136,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 GDP 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都呈现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滞后一阶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3145, 滞后两阶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2023,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方向不同。滞后一阶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 0.2290, 滞后两阶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0777, 即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不同。

表 1 变量间 VAR 系数估计结果

变 量	GDP	SR	ZC
GDP (-1)	1.1493	1.2699	0.0579
	(0.1254)	(0.5968)	(1.3379)
GDP (-2)	-0.1994	-1.0059	0.1136
	(0.1208)	(0.5753)	(1.2897)
SR (-1)	-0.0235	0.2389	-0.3145
	(0.0272)	(0.1296)	(0.2906)
SR (-2)	-0.0318	-0.0498	0.2023
	(0.0256)	(0.1219)	(0.2733)
ZC (-1)	-0.0179	-0.0114	0.2290
	(0.0118)	(0.0562)	(0.1260)
ZC (-2)	0.0093	-0.0248	-0.0777
	(0.0119)	(0.0568)	(0.1273)

注: () 中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我们利用 VAR (2) 模型进一步测度随机扰动项对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 GDP 增长率的具体影响情况:

$$\begin{cases} x_t = a_1 x_{t-1} + a_2 x_{t-2} + b_1 z_{t-1} + b_2 z_{t-2} + \mu_{1t} \\ z_t = c_1 x_{t-1} + c_2 x_{t-2} + d_1 z_{t-1} + d_2 z_{t-2} + \mu_{2t} \end{cases} \quad (4)$$

其中, a_i , b_i , c_i 以及 d_i 都代表系数值, $\mu_t = (\mu_{1t}, \mu_{2t})'$ 代表扰动项, 此外,

$$E(\mu_t) = 0, t = 0, \pm 1, \dots$$

$$\text{Var}(\mu_t) = E(\mu_t \mu_t') = \Sigma = \{\delta_{ij}\}, t = 0, \pm 1, \dots \quad (5)$$

$$E(\mu_t \mu_s') = 0, t \neq s$$

通常来讲, 由 y_i 所引致的冲击所产生的冲击响应函数为: $C_{0,ij}, C_{1,ij}, C_{2,ij}, \dots$, 而 C_s 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可以表示为:

$$C_{s,ij} = \frac{\partial y_{i,t+s}}{\partial \mu_{jt}}, s = 0, 1, \dots \quad (6)$$

我们在图 4 至图 7 中, 鲜明的刻画出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 GDP 增长率之间的冲击响应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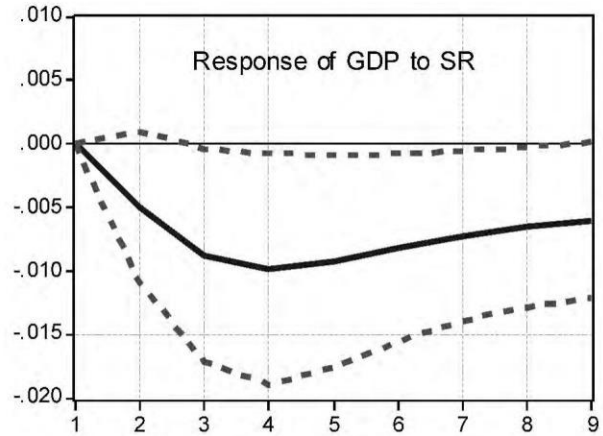


图 4 财政收入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冲击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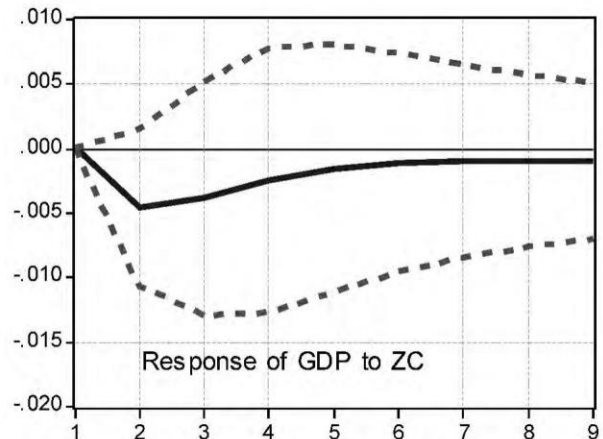


图 5 财政支出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冲击反应

如图 4 所示, 当发生 1 标准单位财政收入增长率正向冲击时, 总体而言, GDP 增长率只呈现出极为微弱的变化。具体而言, 在冲击发生的当期, GDP 增长率并没有呈现显著的变化, 随后逐渐向负方向推移, 并在第 4 期时达到 0.0098 个单位的负向最大冲击响应, 继而不断向零值回归。观察图 5 我们发现, 与财政收入相类似, 当发生 1 标准单位财政支出增长率正向冲击时, 总体来讲, GDP 增长率呈现出更为微弱的冲击响应。具体而言, 在冲击发生的当期, GDP 增长率并没有呈现显著的变化, 随后向负方向推移, 并在第 2 期时达到 0.0046 个单位的负向最大冲击响应, 继而迅速向零值靠近。

如图 6 所示, 当发生 1 标准单位 GDP 增长率的正向冲击时, 财政收入增长率在当期便呈现出 0.0459 个单位的正向影响, 并持续到第 2 个季度, 即在第 2 个季度时的冲击影响仍旧保持在 0.0448 个

单位，随后不断下移，并自第4个季度起，GDP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冲击影响趋于零值水平。如图7所示，在出现1标准单位正向GDP增长率的冲击时，财政支出增长率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就呈现出负向最大的0.0225个单位冲击影响，随后不断向正方向攀升，并在第3季度至第4季度期间冲击反应方向发生变化，自第4季度起，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冲击反应始终处于微弱的正值水平并无限逼近零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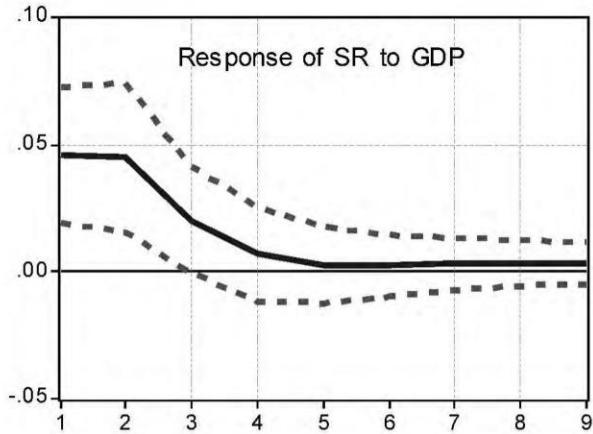


图6 GDP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冲击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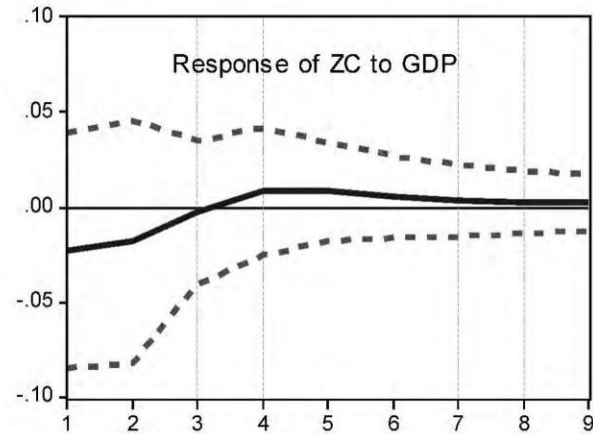


图7 GDP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冲击反应

方差分解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测度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水平的贡献程度。下面，我们基于方差分解方法来识别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相互影响的贡献度问题，方差分解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的贡献程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的贡献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态势，在第3季度达到最大值1.4751。相比较，我们发现，在我们所考察的9个季度内，财政收入增长率都比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更大。财政收入增长率的贡献程度在第9期达到了最大值10.1320。此外，我们还发现，我国GDP增长率对

自身的贡献度占极大的比例，但也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表2 我国GDP增长率的方差分解结果

时 期	标准差	GDP	SR	ZC
1	0.0264	100.0000	0.0000	0.0000
2	0.0403	97.2619	1.4586	1.2794
3	0.0491	94.4234	4.1014	1.4751
4	0.0550	92.1581	6.4620	1.3798
5	0.0591	90.7339	8.0051	1.2609
6	0.0622	89.9114	8.9190	1.1694
7	0.0647	89.4168	9.4783	1.1048
8	0.0668	89.0857	9.8546	1.0596
9	0.0684	88.8411	10.1320	1.0268

三、所得结论与经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1993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1季度期间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季度数据、财政支出同比增长率季度数据以及GDP同比增长率季度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运用冲击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具体考察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问题的，最终获得了如下重要结论：

一方面，基于VAR模型具体测度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具有影响关系的实证结果说明，不同滞后阶数的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GDP增长率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不尽相同，我国GDP增长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较大，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此外，财政收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财政支出增长率对GDP的影响程度。

另一方面，基于冲击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贡献程度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弱，GDP增长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强。与财政支出增长率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响应更为明显。此外，与GDP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影响相比较，GDP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更大。财政收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的贡献程度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的贡献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小，而且财政收入增长率比财政支出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更大。

我们基于实证结果证明了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关系，因此财政政策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当宏观经济处于收缩阶段的时候，应通过扩张政府支出，从而在刺激社会总需求

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收缩的速度以及程度,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健适速增长;而当宏观经济处于扩张阶段的时候,则可以考虑适当延长财政政策的期限结构,从而维系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双重特征,这也从另一方面映照出,我们的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程度的灵敏性。由于我国当前的市场机制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并适时地推出宏观经济调控的财政政策举措,从而更好地配置市场资源。适时调整税收结构并保持适度的国债规模,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因为通过税收政策以及国债的发行,可以直接影响居民和企业等经济个体的实际行为。此外,政府部门在制定具体的财政政策时,不仅要充分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途径,而且还要通过审视现实宏观经济的具体形态及时优化财政政策方式。在财政政策长时间的实施过程当中,其发挥的实际效果以及名义效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都将显著降低,因此,在财政政策具体实施时,应着力实现在社会资源转移配置的过程中发挥财政政策的市场调控功能。最后,在利用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有效管理的时候,不仅应该着重将财政政策的作用从“刺激总需求”转变为“培育总需求”,而且还应该兼顾社会总供给的有效管理,只有真正实现了对社会总需求以及社会总供给进行科学而有效的双重管理,才能确保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

参考文献:

- [1] 白彦,吴言林. 财政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J]. 学海, 2009, (3): 114 - 120.
- [2] 郭庆旺, 吕冰洋, 张德勇.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 (11): 5 - 12.
- [3] 洪涛. 中美财政货币政策效率性实证分析与比较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 (6): 96 - 102.
- [4] 贾康. 地方财政问题研究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 [5] 靳春平.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J]. 管理世界, 2007, (7): 47 - 56.
- [6] 罗来军, 赵鹏飞, 徐震. 中西部地区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检验与对策研讨 [J]. 当代财经, 2009, (6): 28 - 35.
- [7] 王文甫, 王雷. 1990年后中国财政政策效应阶段性分析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 (5): 49 - 56.
- [8] 闫坤, 张鹏.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取向 [J]. 财经问题研究, 2009, (7): 3 - 10.

- [9] Alan J. Auerbach, 2002. Is There a Role for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9306.
- [10] Antonio Fatas and Ilian Mihov, 2001. Government Size and Automatic Stabilizers: International and Intranation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5, 3 - 28.
- [11] Barro, R. J., 1993. "Macroeconomics 4th",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12] Barro, Robert J.,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03 - 125.
- [13] Blanchard, O., 2000. "Commentary", FRB-NY Economic Policy Review, 69 - 74.
- [14] Christiano, L. and S. Harrison, 1999. Chaos, Sunspots and Automatic Stabilizer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4(1), 3 - 31.
- [15] Cohen D and G Follette, 2000. The Automatic Fiscal Stabilizer: Quietly Doing Their Thing,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New York [J], Economic Policy Review, 35 - 74.
- [16] Daniel Feenberg, 2002. The Significance of Federal Taxes as Automatic Stabilizers [J], The Journ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3, 37 - 56.
- [17] Hansen, A. H., 1941.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8] Karras G and F Song, 1996. Sources of Business Cycle Volatility: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a Sample of OEC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6(3), 621 - 637.
- [19] Kormendi and Meguire, Philip G., 1985.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Growth: Cross - Country Evidenc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6, 141 - 163.
- [20] Paul van den Noord, 2000. The Size and Role of Automatic Fiscal Stabilizers in the 1990s and Beyond, Working Paper N0. 230, Economics Department. Political Economy, 89.
- [21] Taylor, J. B., 2000. Reassuring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21 - 36.
- [22] Woodford. Michael., 1995. Price Level Determinacy Without Control of a Monetary Aggregate, NBER Working Paper No. 5204.

(编辑校对: 崔文林)